

474082

台湾经济研究

28.2972

TXF

7.1

第 1 辑

1987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书目文献出版

TXF
987.1

台湾经济研究 (1)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路 雄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5印张 128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5013-0093-3/F·19

(书号 4201·104) 定价 1.40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经济形势

一九八六年国内外经济总检讨

周添成 一

八七年经济趋势预测

林昭武整理 六

经济制度与法律

台湾地区实践民生主义的经验成果与展望

叶万安 八

交易价格制度在我国

苏石碧 一

分期付款在台湾

陈樱琴 二一

分期付款公司“亲身”未明

陈介平 二四

租赁公司的功与过

林贞美 二六

工程招标制度面临危机

董吏安 三〇

劳基法对中小企业影响大

严长庚 三三

金融

一团紊乱的利率秩序

刘 朗 三五

游资要往哪里去？

黄深潭 三八

新台币升值的商榷

何郑陵 四〇

物价膨胀会死灰复燃吗？

黄文治 四二

试以四种经济理论推算新台币合理价位

边裕渊 四五

外贸

我国对外贸易现况与展望

萧万长 四七

简论我国国际市场开拓之几项重点

郭昆谟 五一

改善我国对外贸易措施之研究

丁慎谟 五六

农业经济

我国货币供给与农产价格因果关系之研究

林灼荣 五



一九八六年國內外經濟總檢討

周·添·城*

壹、前言

一般總體經濟表現，不外乎經濟成長、失業、物價變動、國際貿易、金融、與能源等。同時，各問題之間彼此互為因果，形成了複雜的經濟情勢。隨着一九八六年的過去，這一年當中，國內、國際之總體經濟表現如何，值得作一同顧與檢討。對過去的檢討，可進一步瞭解並掌握未來新年度之變動趨向，一方面有利本身的適應調整，另一方面更可因勢利導，建立更有利於發展之環境。

以國內經濟之高度開放程度而言，國際間的成長、物價走勢、乃至於能源價格、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等之變動，對國內經濟自必有唇齒相依的影響。然而，一九八六年的國內經濟表現，一方面雖有國際貿易保護的陰影，但就量化指標而言，却有超乎國際水準的成績：在全球經濟成長持續於中低水準徘徊聲中，我們却創下了百分之十點八的高成長紀錄。究竟什麼原因使我們擺脫八五年的不景氣，而能在八六年國際經濟問題重重之中，獲取如此良好的表現？又國內、國外經濟情勢之互動關係若何？同時，在如此優異的經濟表現後面，我國經濟又將面臨何種挑戰？本文擬對這些問題作一分析。

除了前言外，第二節綜述一九八六年國際經濟情勢，第三節則檢討國內經濟在八六年的表現，最後則為結語與展望。由於經濟問題大多具有連續性，過去一年所種下的種種「因」，將牽動未來變化的「果」。鑑往知來，從檢討中應可知影響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

貳、一九八六年國際經濟的回顧

一、成長緩慢、物價平穩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估計，一九八六年工業國家的經濟成長可達百分之二·七五，開發中國家的成長率則約在百分之二·五至三之間。在利率降低，油價滑落的條件下，無論工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之成長，平均只在百分之三不到的緩慢速度下進行，的確不能令人滿意。就主要工業國家而論，加拿大的百分之三·三成長率居冠，其次為西德的百分之三，義大利

的百分之二·八，美國的百分之二·七，日本的百分之二·六，英國的百分之二·四，法國的百分之二·二。

這些工業國家之所以在八六年未能出現如早先預期的較高成長水準，原因很多，其中各國財政政策的趨於保守當為一重要因素。美國、加拿大、和義大利，均遭遇龐大預算赤字問題，因此預算趨向保守；日本和西德亦穩定地減少預算赤字，而法國和英國則儘量避免財政赤字的擴張。這使各工業國家之國內需求的一大項目——政府支出，未能在去年呈現大幅增加趨勢。至於投資需求及消費需求，則因許多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西德、和法國），正採行、或正積極考慮進行根本性的稅制改革措施，而使民間部門的經濟活動出現觀望性的保守態度，這也使工業國家之需求無法進一步快速提昇。

就開發中國家而言，其成長的重要原動力來自出口擴張，在工業國家（尤其美國）經濟成長緩慢的影響下，連帶也使其出口成長無法大幅提高。這一外在因素，亦使開發中國家財政政策有趨向緊縮的現象。然而，因出口萎縮而使緊縮的財政支出，依然無法避免赤字預算的發生，遂使這些國家陷入出口不振、財政赤字、公共支出削減、進一步的成長抑制或對外負債增加的惡性循環，石油輸出國家是這方面的顯著例子。當然，開發中國家的低成長、高負債，也使其進口能力遭受挫減，因而使工業國家對開發中國家之輸出受到影響，這又使工業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輸出需求無法大幅成長。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這一因果循環，是促成經濟成長緩慢的基本原因。

在國際經濟因總需求的無法有效增加下，再加上，國際石油價格的競逐滑落及其他初級產品價格的平穩，使全球物價均維持在相當低的水準，工業國家的消費者物價約上升百分之二·五，躉售物價則出現負成長的情形，說明了通貨膨脹問題已受到有效控制。因此，主要工業國家的金融當局大多趨向採取放寬的貨幣政策，而使利率自一九八〇年的高峯持續下降，已跌至相當低的水準。預料低利率政策可望繼續在新的一年中維持。

二、石油價格循環變動

Lwt 1/49/04

一九八六年中，另一個受到關注的變動，就是國際石油價格及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策略的轉變。國際油市的變動，反映了石油市場條件的改變，即供需情勢的轉移。一九八五年國際石油供需條件，已顯露出供過於求的態勢。由於油國組織訂價過高，致使價格追隨者的獨立產油國，大幅增加產量，而迫使油國組織必須削減石油供給，才能維持原定較高的價位。但是石油卡特爾的油國組織會員國，却普遍有「坐享其成」(free-riding)的企圖，即希望維持原有產量，同時還能夠在原有高價位銷售，這種條件事實上並無法達成。

早先，乃由沙烏地阿拉伯及科威特等核心國家的「自我犧牲」——減產護價，勉力維持每桶廿八美元的價位，這使沙國產量一度跌至日產僅二百二十萬桶的創低記錄。最後終於在無法繼續犧牲的情況下，宣布自八五年十二月起放棄官價。因此，八六年的國際油價即一路滑落，至七、八月間，連個位數字的水準，使石油生產國遭遇很大的外匯危機，有許多過去擁有雄厚美元資金的國家，紛紛陷入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困境，進而導致財政預算赤字，使其國內經濟條件惡化，甚至影響其對外購買力，也連帶引起部分工業國家（如美國）之出口受不利影響。

由於石油價格跌破個位數字，產油國損失不貲，亦使發動油價戰的沙烏地阿拉伯成為產油國的眾矢之的，也使沙國前石油部長雅曼尼的「殊死戰」無法持續，甚至導致沙國王室的免職。這一事件明顯說明沙國在石油策略上的轉變，企圖重新回復過去的油價訂定角色。經過八六年八月與十月的兩次臨時性協議，油國組織已能成功地將超過原有配額的產量減縮回去，恢復早先的產量配額水準，更進一步奠定油價統一的基礎。終於在十二月中旬油國組織年會中，達成減產百分之七的協議，以便將價格回復到每桶十八美元的水準。

由於油國組織減產的行動，國際油市價格已反彈至其目標價位。同時，各產油國已紛紛取消原有通算法或其他折扣計價，而改採協議的十八美元價格銷售石油。預料，除非在油供上受突發因素的影響，否則十八美元的價位應可維持一段時間。從八六年初的每桶約二十美元，到七、八月間的每桶不到十美元，以至八六年底的回復近十八美元，可以看出國際油市在這一年間波動之顯著。這一變化，固使石油消費國短期受益，但卻陷石油生產國於外匯不足的困境。此一國際收支的劇烈變動，使全球貿易總額有收縮的傾向，八六年世界貿易量雖增加了百分之四·二五，但貿易值（以SDR為單位）却減少了百分之九·二五。

三、國際貿易不平衡與匯率急劇變動

八六年的國際經濟表現，以貿易的不平衡和匯率激烈變動最為突出。

貿易的不平衡以美國為最，預計全年的貿易逆差將達一千七百億美元的創紀錄。美國貿易赤字主要來自日本、加拿大，我國則居第三位。就金額言，一九八六年我對美順差預計將達一百五十億美元以上，韓國順差亦將達七十四億美元之鉅，導致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聲浪特別高。

除了貿易的摩擦外，美國更迫使主要工業國家壓低利率，企圖擴大這些國家的國內需求，以緩和美國貿易赤字的惡化。同時，從八五年九月五國（美、日、德、法、英）聯合干預匯率後，高估的美元匯率乃呈大幅下跌，在八六年間，美元貶值幅度很大，尤其對日圓的貶幅更大。八六年元月，美元兌日圓的匯率尚在一美元兌二百日圓以上，自八六年二月起，由於美國官方一再表示美元至少應再跌百分之十〇—一五，以改善其貿易逆差，再加上美國經濟成長微弱，致使美元兌日圓匯率一路下跌。

八六年二月十日起美元兌日圓開始大幅下跌，二月十九日突破一百八十日圓大關，三月十八日更達一七四·九日圓的新紀錄。四月間美元匯價再度下跌，四月廿八日達一六七·二五日圓。五月初，東京高峯會議上，美國拒絕日本首相所提共同干預外匯市場，以抑制日圓滑落的消息傳聞，美元進一步下跌，五月十二日曾破一六〇大關，達一五九·九九。此後雖有回升，但終因美國經濟不振，貿易逆差未見好轉，而於七月再告滑落，八月廿一日又創下一美元兌一五三·〇三日圓的新紀錄。九月上旬美元匯價雖曾短暫回升，到了中旬因美國經濟成長仍未起色，再加上日本、西德、未應美國之要求將利率調低，而有再度壓低美元匯價的傳言，導致日圓於九月十八日再度升至一美元兌一五四日圓的水準。十月後因美國經濟指標好轉，逆差縮小，而使美元對日圓匯價再度回升，並於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維持在一美元兌一六一·一六四日圓之間。

和上述變動趨勢相近的是美元兌馬克之匯價，從八六年元月的一美元兌二·四三九馬克，二月為二·三三一馬克，三月達二·二六四馬克，四月為二·二七二馬克，五月二·二八三馬克，八月以後則平均在二馬克左右。九月十八日突破二馬克關卡，達一·九九七五馬克，十一月亦曾一度跌破二馬克的記錄。就各主要通貨兌美元匯價之變動情形觀之，一九八六年以來至十二月十二日止，日圓及瑞士法郎兌美元匯價上升幅度最大，達百分之廿三左右，西德馬克及義大利里拉升幅約百分之二十，法國法郎上升百分之十三，英鎊則下跌百分之十一·二。

綜觀一九八六年的匯率變動，主要係受美國經濟指標的影響最鉅。美國經濟好轉，則美元匯價回升，反之則大幅挫落。此外，還受美國貿易逆差金額的影響，及為美國財金當局之匯率「宣示效果」左右。由於美國經濟成長緩慢，對外貿易逆差更創下空前記錄，因此，美元兌主要工業國家通貨（除英鎊外），均呈相當幅度的貶值。匯率的急劇波動，助長了國際

間外匯交易金額的迅速膨脹。同時，也造就及提昇了美元、馬克以外第三個國際性通貨——日圓的國際通貨地位。

四、貿易保護主義與新國際貿易秩序

由於國際貿易在國與國間的不平衡，除了引發匯率的激烈變動外，還造成貿易對手國間的尖銳摩擦，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更是高度膨脹，成了一九八六年國際貿易的另一個特徵。對雷根政府而言，由於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聲浪很高，層出不窮的貿易保護法案，如鞋類進口救濟、紡品輸出限制、及綜合貿易法案等等，均對行政部門造成極大壓力。

為了應付民間及國會的壓力，雷根政府於八六年九月宣布了所謂的「雷根貿易政策」，即以主動要求打開美國貿易對手國（尤其是對美順差國）的市場，取代把美國自身市場加以關閉的貿易保護手段，以追求貿易逆差的縮小或消除。這種易守為攻的貿易政策，已從過去純粹的自由貿易精神轉化為所謂的公平貿易主義，因此，要求各國開放市場公平對待美國商品或企業，成了美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變形。之所以仍然冠上貿易保護的名銜，主要是因美國在要求開放他國市場時，主要掌握的工具仍然是以關閉美國市場為要脅，所以，有人戲稱這是披上羊皮的貿易保護主義。

美國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或雷根貿易政策，除了表現在與個別貿易國（如日本、中華民國、韓國、西德、歐市等）間的經貿談判與壓力外，尚以發動新回合「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多邊貿易談判為其長程經濟策略的目標。由於，現階段美國產業的對外競爭優勢，以農業、服務業、及高科技產業為主；但這些產業在現行GATT體系下，並未具充分自由貿易的條件，而使美國亟思扭轉貿易逆差的努力，沒有強力國際規範作後盾，這是何以須動用美國市場作為脅迫手段的原因。

為了重新建構有利於美國經濟優勢的國際貿易體系，須要把農業、服務業、及科技保護列入目前的GATT制度。因此，召開新回合多邊貿易談判，遂成了雷根長期貿易政策的目标。這一理想，終於在雷根政府挾其高漲的國內貿易保護壓力作為後盾的情況下，於八六年九月烏拉圭的GATT年會中，獲得初步的成果，即新回合的「烏拉圭談判」，將自八七年起進行，預計四年內完成。同時，農業、服務業、及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均如願列入新回合談判中。預料，這一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將對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有新的安排，使GATT涵蓋的範圍延伸到服務業等部門。除了GATT新回合多邊談判已議定外，八六年尚有一項國際貿易協定——多種纖維協定（MFA），已於七月底原有協定期滿後，又獲得延長。MFA新回合協議的簽訂，由於在進口國貿易保護主義高漲的情況下，因此不但未見放鬆紡品貿易限制，反倒是擴大紡品貿易限制的範圍，將絲、麻織品列入MFA規範之列。基於新階段愈趨嚴格的MFA精神，中美

紡品協定亦已簽署，觀其條件較美韓、美港更為不利，主要理由是因我國紡品進口關稅過高，為因應這一情勢，我已主動調低紡品進口關稅，並已取得重新與美國協商承諾，如何爭取較有利的輸出條件，為當務之急。

由於我國紡品出口仍佔重要地位，MFA或中美紡品協定，影響甚鉅。就MFA新回合的簽署而言，事實上應對國內紡織業者有利，因為配額已形成強力保護功能，繼續維持現制，應屬有利。這也算是一九八六年國際貿易中的重大事件，值得重視。

叁、一九八六年國內經濟的檢討

一、高度成長與低物價變動

一九八六年中華民國的經濟表現，超乎預期的好。估計全年經濟成長率將達百分之二〇・八，是一九七九年以來的最高記錄，較諸八五年的百分之四・七，超出一倍以上，第三季的成長率更高達百分之一・五的水準，表現良好。預計每人GNP可達三千七百四十八美元（八五年時僅為三千一百四十四美元）。十一月之工業生產年增率達百分之二〇・四，失業率降至百分之二・六，出口增加百分之四四・三，進口成長百分之二五・四。

物價方面，八六年一至十一月，躉售物價下降百分之三・四，消費者物價則上升百分之〇・五。明顯的，全年物價相當持平，貨幣供給的大幅增加，尚未對實際物價產生影響。但躉售物價與消費者物價之差距將近四個百分點，可見行銷階段的廠商壟斷力量甚強，值得未來的產業競爭政策加以注意。

從許多相關資料可以看出，八六年的經濟情況，已經擺脫八五年的不景氣陰影，創下了高成長、低物價變動的佳績。在這些令人羨慕的成長數據之後，由於貿易順差的擴大，導致對外經貿關係緊張，經貿談判挫敗，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也引發匯率與貨幣供給的難以控制，同時國內需求始終未能有效提振等等，在在是八六年國內經濟所遭遇的困難，依次說明如下。

二、國內油價政策的爭議

由於國際油價在一九八六年間的劇烈波動，在國內引發了究竟應否反映進口原油成本降低的爭議。中油公司的訂價政策引起民衆、學者、民意代表、甚至政府官員間的爭論。迫於輿論的壓力，政府曾在八六年四度調低國內油價，但仍未徹底消除彼此間的歧見。

國內油價政策的爭議，涉及公營事業因進口成本節省所帶來的超額利潤歸屬問題。有人主張，根本不應讓中油公司利用原油價格下跌而享有超額利潤，亦即應悉數將進口成本反映到油價上；即使國內油價與進口原

治成本的調整幅度有所不同，政府也只能調整「能源稅」的稅率，將其間差額歸入政府的「稅收」。然而，部分政府官員却認為，進口原油成本與國內油價間的差額可自由訂定，換言之，油價可不必反映（或不必要全數反映）原油成本，同時該差額可經由中油公司的盈餘撥庫方式，由政府統籌運用，但不必以課稅方式操作。

基本上，這一爭議除了政策目標的價值判斷不同以外，尚包括民主、法治精神遵守程度的差異。直接以中油公司盈餘的多寡，來調節國內油價與進口原油成本的差距，是取行政權操作的便利，換言之，也是行政管理權限的擴大，似乎與國內政治發展趨勢背道而馳，難怪受到很大的批評。為了解決這一爭議，國內油價應在政策層面上有所釐清。

三、經貿談判的挫敗

一九八六年的高度成長，無疑的，仍然是憑藉着出口擴張而來的。一至十二月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六百三十九億餘美元，出口為三百九十七億餘美元，進口為二百四十一億餘美元，出超達一百五十六億餘美元。這一貿易表現，除了帶來高成長外，却也帶來經貿關係的緊張情勢，尤其是中美雙方貿易不平衡的不斷擴大，引發了一連串的經貿談判。

誠如上一節所說明的，美國為應付日益嚴重的貿易逆差問題，以要求開放順差國市場為主要手段，其中，美國為首當其衝的對象。八六年間，中美雙方的經貿談判大致有：例行的「普通化優惠關稅」（GSP）之貿易協商、根據美國貿易法三〇七條的「汽車外銷比例」調查案、三〇一條的「完稅價格」報復案，及「中美菸酒談判」、工具機自動設限、銅品出口設限、以及中美紡織品協定談判等。

檢討上述各項談判，幾乎在所有的案件中，我方得到的大多是最差的條件。無論GSP的被削減、菸酒進口條件、工具機設限與紡織品協定等等，相較於其他類似的談判國，我們得到的是出口最嚴格的限制，進口最寬鬆的條件。至於完稅價格、外銷比例，則純為國內政策與執行的不當所引起。

因此，若對八六年的中美經貿談判作一總評的話，明顯的，我們是在談判上吃了虧。除了談判技巧上的追求外，即使以我國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總目標作為評定談判的成敗標準，仍然會發現我們在經貿談判上的挫敗。換言之，經由談判導致的國內進口保護降低，若符合自由化精神，那麼，在許多輸出項目的談判上，未能爭取到最有利的條件，應是最大的損失。我們的對美經貿談判，不論在攻或守上，兩頭均吃虧的結果，足以證明在這一方面還應予以強化，否則面對往後不斷的經貿談判，將再度使我方利益受損。

欲強化中美經貿談判的利益，則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原則的貫徹，應是首要條件。堅持這一原則，可以在開放國內市場上作更大的讓步，相對地也應以取得美國市場確保為條件，此為今後談判的策略，否則像八六年的許多談判，經常因原則、立場的不確定而吃虧，是很不划算的。

四、外匯及金融問題的嚴重

貿易的不平衡，連帶引起金融面的失衡，外匯市場出現供過於求的情形，在現行外匯管理制度下，外匯之供過於求，只有藉着外匯存底的累積或新台幣匯率的升值，才能解決。由於中央銀行一向採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因此，貿易的出超，直接就反應到外匯存底的快速累積。據中央銀行表示，目前外匯存底已累積至四百六十億美元，幾乎已成為世界各國中央銀行擁有外匯金額最多的國家，的確值得重視。

外匯存底的持續累積，主要副作用就是貨幣供給的難以控制。為了抵消龐大外匯所放出的鉅額新台幣資金，中央銀行採取一切可能的沖銷政策。即使如此，貨幣供給之增加率仍高達百分之四八，這麼高的貨幣供給增加率，對物價具有相當沉重的潛在壓力。雖然，如前所述，國內物價迄今仍相當平穩，然而，潛在威脅仍大。今後若遇上國內價格稍有變動，則龐大的貨幣數量將引發可怕的後果，是貨幣供給額成長率居高不下受到注意的原因。

根據研究，國內物價的變動，主要受進口物價及國內貨幣的影響，同時隨着開放程度愈高，受進口物價的影響愈大。因此，目前國內貨幣供給的高成長，對物價的直接影響尚未發生，惟若國外物價波動，則貨幣將見推波助瀾之勢，不可輕忽。

貿易的不平衡，當然也對匯率造成壓力。過去一直採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致使八六年八月上旬以前，一美元尚可兌新台幣卅八元，但到了中旬，由於傳言美國將與我國談判匯率開始，新台幣即對美元緩慢升值，到了十二月更出現不規則的、較大幅度的升值，年底時已達三五·五左右的水準。

新台幣兌美元的匯率，究竟將達何水準，事實上並非完全由市場來決定，主要取決於我國與美國的政策目標。若美方壓力增加，則進一步的升值將不可避免，因為在對美貿易順差一年一百五十億美元的條件下，我方維持匯率的力量顯得相當薄弱。而匯率的走勢，將影響今後我國的短期貿易績效及長期貿易結構，其影響層面相當深遠。同時，匯率因素的影響程度，尚取決於相對競爭國，如韓國之韓國匯率變動程度，若中韓匯率變動幅度差距愈小，則匯率變動之貿易衝擊也將縮小。

五、國內需求的不足

國外部門的不平衡，除了可能引起經貿衝突、匯率調整外，主要更反映國內需求的不足，即投資落後於儲蓄，或儲蓄過多、投資不足。國內投資不足與貿易出超，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同時發生。所以當我們過分依賴出口擴張作為成長原動力時，可能出現國內投資需求不足的缺口，這對長期經濟的成長有不利影響。

若欲縮小國內需求不足的缺口，基本上可以增加消費、民間投資，或政府公共支出等方式來解決。增加消費的方式，是以降低儲蓄率來調整儲蓄超過投資的問題，而增加投資則是另一種方法。若以長期成長的觀點，可能以以增加投資較為有利。但民間投資受投資報酬、技術、資金等條件之限制，欲排除這些限制，非短期可奏效。至於公共投資，也牽涉執行能力是否足夠的困難，這些都是目前所遭遇而始終未見突破的困難。預料這一問題仍將持續困擾國內的經濟。

面對這一情勢，有關當局如何儘速釐清國內投資環境，排除經濟的、非經濟的投資障礙，包括儘量降低制度調整的不確定性，應是首要的任務。國內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方向、經濟政策，可能正面臨另一轉捩點，此時，政府的政策取向若何，將決定未來經濟環境的走向，影響深遠。因此，各項改革計畫，有關單位應早作規劃，並宣示確切的時間表，以減少不必要的環境不確定性，此對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等國內需求之提高，當有助益。

當然，在減小國內需求差距時，應同時放寬進口限制，以便同時縮小貿易差額。否則，若僅縮小儲蓄超過投資的部分，國外貿易差額依舊，很可能因需求超過供給而引發可怕的物價膨脹，這是應特別注意的。總之，國內需求，尤其是投資需求如何有效提高，以及貿易差額的縮小，為八六

（上接第七頁）

香港面臨的隱憂仍然以中國大陸市場的穩定為主，其次則是九七大限造成的政治情勢，將使香港的長期投資減少。但這兩個地區的金融服務業仍然一枝獨秀。

韓國的主要競爭力來自重工業，汽車已成為韓國第三大出口產業。而韓國整體政策運作及努力也較我國積極。對內，奧運的投資使經濟成長有傑出表現；對外，去年貿易也已開始出

年延續下來的主要經濟問題，宜由財政、經濟、金融三部門合作、協調，共謀對策。

肆、結語與展望

本文試對一九八六年國際與國內經濟情勢作一回顧與檢討。其中，國際石油市場變動，引發國際石油價格的波動，為一凸出事件，連帶引起國內油價政策的爭議。這一爭議，雖隨著國際油價的回升而暫告停止，惟若不從根本政策上化解不同歧見，將來在國際油價再度波動時，必又產生另一次的爭論。

至於一般經濟情勢，國內在經濟成長的表現，遠超過全球緩慢的成長趨勢，百分之二〇・八的成長率，相對全球平均不到百分之三的成长，可以看出國內的傑出表現。

然而，在快速成長的背後，國內經濟正遭受由貿易順差所帶來的種種副作用，包括經貿關係的緊張，國內需求不足，及外匯累積過多，貨幣供給成長太快、台幣升值壓力等。這些問題，正與國際間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國際匯率激烈變動相呼應。一九八六年為這些問題所困，預料一九八七年這些複雜問題尚無法解決，如何面對這些不平衡問題，堅持自身調整的原則與方向，以追求結構調整過程之最大利益，仍是未來的主要課題。

•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中興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用外匯向海外借債

面對今年可能局勢，企業界應如何因應？學者們建議，應該朝三個方向努力。第一是利用去年景氣好轉獲得的利潤做好更新設備、汰舊換新的工作，以求提高品質。

其次，在談自動化之前要先求經營合理化。美商安強鋼，只有合理化才能避免人力、材料及時間的不必要浪費，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最重要

要的是，在目前日圓升值逐漸穩定，台幣相對優勢漸失的情勢下，儘快分散產品市場。

至於政府可以採取的行動，除了加強公共投資外，于宗先也提出「智慧投資」的觀念，向海外借債。他建議利用目前大量外匯存底，從海外聘請專家回國傳播新科技、新觀念，他強調：「今天我們不借，別人就要借走了。」

（林昭武整理）

（原載：中國經濟「台」一九八七年
四三六期 五一八、一二頁）

（原載：天下雜誌「台」一九八七年 六八期 一五五—一五八頁）

八七年經濟趨勢預測

編輯部

一九八六年我國經濟成長一〇·七七%，是出乎意料的大豐收。今年還會維持這麼好的表現嗎？衆所矚目的台幣匯率走向如何？天下雜誌特別邀請四位來自政府與民間經濟研究機構的學者專家，對今年的經濟提出預測和分析：

去年一年，我國在經濟上的大豐收，出乎許多專家意料，這份成績單是前年一片衰退聲中始料未及的：

經濟成長率一〇·七七%；出口成長二二·〇五%；貿易順差高達一三八億美元；固定投資增加一%，而消費者物價指數僅上漲〇·六六%。

由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第一銀行副總經理柯飛樂、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于宗先、中研院經研所副所長李庸三組成的天下雜誌八七年度經濟預測的學者專家指出，今年成績將不如去年。

去年我國表現如此傑出，主要拜日圓、歐幣對美元大幅升值之賜，得以經由出口擴充帶動整體成長。而工資雖然上漲一〇%，但勞動生產力大幅

增加，維持單位勞工成本不變，也相對提高了我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難保二位數成長

但是，由於今年日圓、歐幣升值趨勢已經平穩，台幣不再享有相對優勢，工資也開始感受到上漲壓力，加上國際保護主義日益熾烈，今年經濟可能無法保住二位數成長的佳績。

四位學者專家預測，今年國內總體經濟情勢大約如下：

——經濟成長約可維持七·五%。由於出口優勢不再，必須經由提升國內需求來推動經濟成長。國內需求主要來自政府投資與民間消費的增加。

——出口約可維持八·五%成長，去年因預期台幣升值而延遲進口部分，

在今年將開始實現，全年進口約可增加一五%左右，但整體來看，仍會有大量順差出現，可能仍將達一百三十多億美元。

——匯率將仍是一個難以捉摸的變數，主要視出超情勢、中央銀行政策及沖銷能力而定。一般預料，年底約會升到一美元兌三十三·五元新台幣左右。

——受貨幣供給過多及預期心理的影響，加上工資上漲及國內需求增加，消費者物價指數今年將上升五%左右，零售物價將維持二%水準。

——貨幣供給的壓力仍然沒有解除，出超、匯率變動及央行沖銷政策的效

果，將左右貨幣供給增加的幅度。上半年可能仍然維持在四〇%左右，但預估下半年約可降到二〇—三〇%水準。

成長依賴國內需求

天下雜誌年度經濟預測的四位專家指出，由於今年不再能依賴對外出口帶動國內經濟，我國必須致力於拓展國內需求，以維持經濟成長。主要的途徑有提高投資及刺激消費。

葉萬安指出，由於今年十四項建設

的推動到達高潮，五輕計畫的進行，及對公害污染防治的要求越來越高，今年投資情形將會比去年熱絡。據估計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將可成長三〇%。而去年因民間預期台幣升值延緩的進口，將在今年陸續實現，加上存貨水準維持不降，全年民間投資可望成長九%，估計全國固定投資可以增加二一%，這對刺激國內需求大有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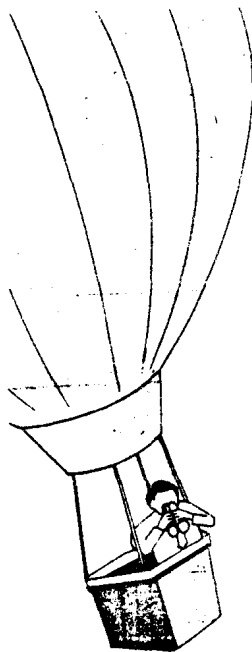
至於刺激民間消費的因素，除了所得提高與開稅降低外，李庸三認為，去年因預期台幣升值、耐久財價格下跌，而延期到今年的消費支出，也將是主要來源。

匯率將跌破三五

熱門話題的匯率水準，仍舊是一個謎，但是以目前的出超及外匯操作情勢，原本預測今年平均會在三十五元左右的葉萬安說：「現在可能連三十五都保不住了！」

而防衛匯率大關的中央銀行，在操作外匯的技術上，似乎有待加強。不僅僵固的操作方式引起廠商強大的預期台幣升值心理，紛紛採取各種途徑設法套取利益，連外商銀行也因可以優先賣掉外匯而透過不同管道趁機賺取差價利益。相對之下本國銀行則受制於體系、制度，沒有拒絕接受外匯的權利，先天註定要虧損。李庸三形容目前的局面是：「外商銀行吃本國銀行。」

針對鉅額貿易出超的影響，柯飛樂認為，單靠匯率調整順差，不僅「副作用太大，而且很艱苦，時間也太久」。四位學者一致建議，應該採取多種政策搭配的解決途徑。



他們提出的政策搭配是：大幅降低關稅、開放進口、減少非關稅障礙、增加公共投資、大幅升值及適度放寬外匯管制等。並指出唯有如此，才是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正確途徑。

國際經濟情勢方面，四位專家指出，今年各國經濟將呈現穩定成長，世界景氣也將逐步好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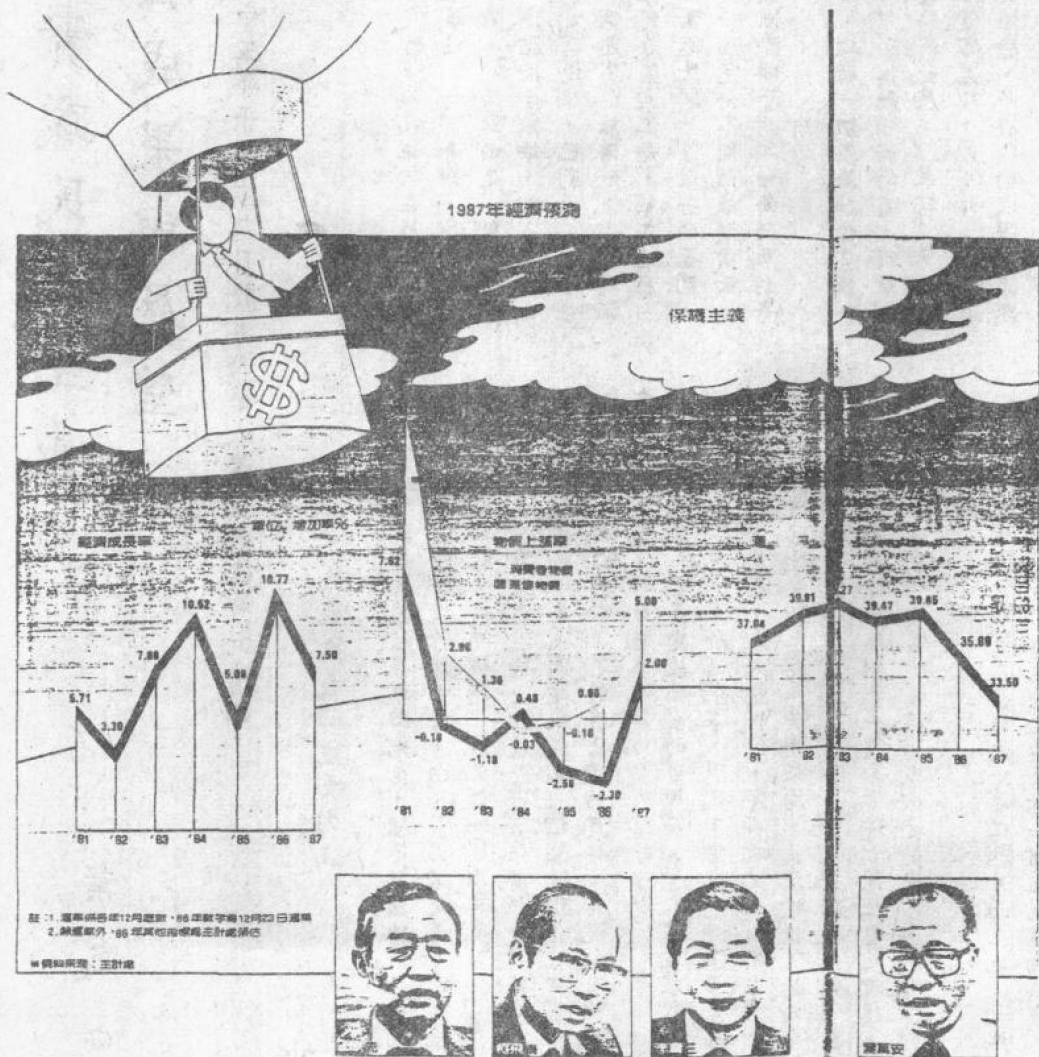
美國地區經濟成長將提高到三・五%，西歐為二・五・三%，日本約可維持三・五・四%，亞洲其他地區整體成長平均則在四・五%。由於世界各國經濟成長普遍好轉，將有利我國出口貿易。

于宗先指出，雖然世界需求普遍逐步復甦，但是因為全世界農產品供應仍有剩餘，進口糧價今年不致上漲。而大宗原材料及石油價格不會再下跌，預料仍可維持平穩。

值得憂慮的是貿易保護主義如日中天，于宗先語重心長地說：「現在美國人只要拿三〇一法案嚇嚇，我們就會讓步了。」他認為美國目前的貿易報復心理，短期之內不會消失，這對未來要求我們開放市場及設限上，將更不利。

韓國仍為勁敵

在國際競爭對手方面，對我國威脅較大的亞洲四小龍中，仍以韓國較為強勁。于宗先認為，新加坡由於過去採取漸緩的高工資政策，及部分產業發展已不再具有比較利益優勢，未來將無法與我國抗衡。李肅三也指出最近印尼、馬來西亞等周圍國家都已紛紛分離，獨立發展本國貿易，新加坡成為東南亞主要轉口貿易國的計畫將更難實現。



臺灣地區實踐民生主義

的經驗成果與展望

葉萬安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於美西華人學會學術研討會講

一、前言

臺灣光復之初期，由於農、工、交通運輸設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嚴重破壞，因而生產萎縮，物資奇缺，民生凋敝。迨至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遷臺之時，所面對的是一個物價飛漲、失業問題嚴重、財政鉅額赤字、外匯極度短缺、貧富不均的落後農業社會；大多數人民都生活在貧窮邊緣，已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景況。而對這麼一個惡劣的經濟狀況，當時海內外很少人對臺灣經濟的未來抱持任何希望。但是，就在這麼一個幾近絕望的環境下，臺灣地區八百萬軍民開始了艱苦的奮鬥，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經濟畫面，成為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楷模，被國際間譽為「經濟發展的奇蹟」。

在過去這一段奮發圖強的歷程中，政府一切經濟社會建設，皆以民生主義為最高的指導原則，一方面推動經濟計畫，有效利用美援，鼓勵儲蓄與民間投資，加速經濟發展，以求富；另一方面實施平均地權，發達國家資本，縮短貧富差距，以求均。茲就民生主義的主要內涵、實踐民生主義的經驗、所獲得的成果與未來展望，分述於後。

二、民生主義的主要內涵

民生主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繼承我國傳統思想的道統，並吸收西方最新學說所創立的。由於國父是革命家，一切思想均以實踐為依歸，我們研讀國父的「民生主義」、「實業計畫」及有關文獻，不難發現民生主義是國家經濟社會建設的構想與藍圖，最後是要將中華民國建設成為一個經濟現代化國家。因此，以民生主義建設國家，不僅有明確的目標，為達到目標應有的政策及經濟制度，亦均已具備。

首先就民生主義建設國家的目標而言，不僅在求富，而且要求均，即「均富」。所謂求富，現代用語就是經濟發展，不僅要解決人民生活問題，人人吃得飽，穿得暖，人人有工作，而且還要不斷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所謂求均，就是建設成果為全體國民所共享，避免為少數人所壟斷，以縮小貧富差距。此即國父所說：「畢產業革命與社會革命於一役，實現大同社會之理想（註一）。其次就達到「均富」目標，應採之對策言，約有下列五端：

（一）平均地權

由於土地與資本是生產的最重要工具，而土地為天然存在之物，非人力所創造，為避免資本主義早期土地過度集中，所導致

的財富分配不均現象，並且使土地之利為社會大眾所共享，必須實行平均地權（註二）。實施平均地權，並非沒收土地，或將土地完全收歸國有，而是在農地方面實施「耕者有其田」；在都市土地方面，課徵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使「漲價歸公」，以供地方建設之需，由社會所共享。

（二）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

在資本方面，國父主張「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國父只講節制私人資本，始終未講沒收私人財產。惟為避免私人資本之過度集中，政府一方面應努力設法減少市場中獨占與壟斷的成分，另方面則應對「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由國家經營管理之（此即發達國家資本）」，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先總統蔣公為避免國人對國父所講之「節制私人資本」一語有所偏解，曾指出：「節制資本者，並不能專在限制發展方面着想。我以為節制之節，實為調節之節；節制之制，乃為管制之制。」所以「節制資本，並非限制私人資本，乃將私人資本由政府予以調節管制，使之有計畫的發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不危害國家整體利益。」

（三）有計畫推動經濟建設

國父深知我國天然資源豐富，但缺乏資本與技術，更缺乏有魄力有遠見的實業家，因而發展實業必賴政府有計畫的推動。於是國父親自草擬「實業計畫」，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完成。其中除包括海港與鐵路系統等基本設施建設外，尚包括工業建設及礦產之開發等，可說是世界上最早最具體的經濟計畫（蘇俄實施的第一次五年計畫是在一九二九年，較國父的實業計畫晚了八年）。

四利用外資與國外技術

國父慮及為彌補國內資本與技術不足，特將「實業計畫」用英文撰寫，命名為「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實業計畫」。其中指出吸引外資，要一切操之在我，並應選擇最有利的途徑，以予有效運用；所吸引之國外技術，亦應教授訓練我國人員，使技術在國內生根。

（四）公民營並存的經濟制度

在國父的實業計畫中，曾明確指出：「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①個人企業，②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

綜上所述，民生主義不僅肯定私有財產制度，同時也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亦即尊重經濟自由。這兩點也是利潤動機與激勵制度存在的必要條件，激勵制度又是市場價格機能的原動力，而市場機能可以促進資源的有效運用，創造更多的財富。所以民生主義「求富」的目的，是與其尊重私有財產及市場機能的作法相一致。不過民生主義在追求富裕之同時，亦利用經濟計畫匡正或彌補市場機能的不足，使社會中每一分子都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亦即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優良成分加以綜合，亦即取兩者之長，捨棄兩者之短，而做的最佳設計。

三、實踐民生主義的經驗

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遷臺後，政府為解決面臨的各種困難，將上述民生主義主要內涵，落實到各種經濟社會建設政策上。其中最重要者有：

（一）實施土地改革——平均地權

平均地權分三個階段進行。三十八至四十二年實施農地改革，四十五年實施市地改革，六十六年實施全面平均地權。在這三個階段中，最有貢獻而且影響日後經濟發展最深的是農地改革。農地改革的主要步驟是三十八年實施三七五減租，四十年實施公地放領，四十二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最後實施耕者有其田是將大地主的土地，超過水田三公頃或旱田六公頃之多餘部份由政府收購轉售給農民。地價按當時主產物價值的二·五倍計算。政府在支付地價時，一方面為避免引起物價膨脹，另一方面考慮地主取得現金以後受到貨幣貶值的影響。因此在支付地價時，係以實物（糧食）債券及公營事業股票償付給地主。而農地轉給農民，地價亦為主產物的二·五倍，農民分十年償還。耕者有其田的實施，產生了下列作用：

1. 在實施農地改革前，佃農終年辛苦收入的一半給地主，因此佃農收入低微，為當時所得不平均的原因之一。經完成耕者有其田後，耕者擁有自己的田地，不必繳納地租，所得完全為自己所有，提高低所得者的收入，促進社會公平，使所得不平均的現象獲得改善。
2. 由於佃農成為自耕農後，增產的所得完全為耕者所享有，提高農民增產的興趣，使農業生產力大幅提高，不僅充分供應糧食的需要，使糧食價格穩定，工資穩定，進而使嚴重的物價膨脹漸趨緩和。
3. 為了配合耕者有其田，政府曾將四家大規模的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作為償付向地主購耕地的價款。因此，引起一向保守的地主從事工業活動的興趣，擴大了工業發展的力量。
4. 打破傳統社會階梯，使政令與技術的傳播更為便利。

(二) 推行經濟計畫——有計畫的推動經濟建設

國父的實業計畫雖不適用於臺灣地區，但政府掌握了國父研擬實業計畫的基本精神，自四十二年開始在臺灣實施一連串的中期經濟計畫，並積極參與各項經濟建設，以彌補民間企業家的不足。由於設計經濟計畫，不斷的對過去經濟發展作檢討，謀求改善途徑，並對面臨的經濟問題，以及為達到今後發展目標，可能遭遇之困難，研擬對策。因而此一作法不僅能及時掌握經濟情況的變化，更由於事先的規劃，採取正確的策略與未雨綢繆的措施，使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與困難減至最小程度，而獲致順利的發展。

過去三十餘年，在有計畫的推動經濟建設過程中，政府所採策略與措施，其中最重要而影響較深遠者有（註三）：

1. 經濟成長與穩定並重

經濟成長與經濟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兩大目標。每個國家都希望經濟快速成長下同時保持經濟的穩定，但能達到此雙重目標的國家極少。根據各國經濟發展經驗，顯示經濟快速成長時，即是物價膨脹時期；各國為維持物價的穩定，不得不犧牲成長。我國是一個飽受物價膨脹之苦的國家，對物價穩定的重視，並不低於其他國家。但我國在經濟發展早期，尚屬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如不能保持經濟的快速成長，則與工業國家間所得的差距，將無法縮小。我們的信念是：經濟穩定是經濟成長的基礎，經濟過速成長雖可能招致物價膨脹，引起經濟的不安；但經濟成長是維繫經濟穩定的力量，只有穩定而無成長或緩慢成長，則經濟停滯，經濟亦難於持久穩定。因此，認為經濟成長與穩定是相輔相成的，而將「穩定中求成長」列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亦為我國一貫追求的目標。

2. 鼓勵儲蓄增加投資財源

我國在經濟發展早期，不僅所得低，儲蓄更少。民國四十年代，儲蓄率（即儲蓄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尚不及一〇%，投資的四〇%依賴美援支應（註四）。政府為突破落後國家「所得低、儲蓄少、所得低」的惡性循環，經研究決定應從提高儲蓄著手。於是一方面利用租稅政策，對高級消費品及服務，課徵較高的稅率，增加其負擔，以達到節約消費，寓禁於徵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用金融政策，創辦儲蓄存款，提高利率鼓勵儲蓄；並對儲蓄存款所獲得的利息，給予免稅優惠。同時，有效利用美援加速經濟成長，使增加的所得，少用於消費，多用於儲蓄。在此雙管齊下的鼓勵下，儲蓄大幅增加。至六十一年儲蓄率已突破三〇%（註五），投資財源充裕，使我國成為少數高儲蓄國家之一。此亦為我國能長期保持經濟快速成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3. 促進民營企業發展

我國在經濟發展初期，不僅以農業為主，工業部門亦多為公營事業。在四十一年時公營製造業生產占製造業總生產的五六%，民營僅占四四%，且均係中小企業。政府鑒於公營事業受法令規章等種種之束縛，效率難於提高，同時政府充分了解「自由企業」對促進工業發展的重要性，而且民生主義不僅不排斥民營企業，只要不是獨占事業還可由國家給予獎勵，並以法律加以保護，遂決定未來的工業發展應以民營事業為主。除將當時四大公營公司（臺灣水泥、紙業、工礦、農林公司）移轉民營外，並決定未來工業發展，除原有公營事業之必要擴充，或有獨占性者，仍由政府投資外，新興投資計畫以鼓勵民營為原則（註六）。惟當時因民間缺乏有遠見、有魄力的企業家，而銀行均係公營，亦未善盡輔導促進投資的責任，因此政府為促進民間投資，不僅研擬投資方案，召請民間企業家參與投資，甚至政府擔任創辦人，投資

設廠獲利後再轉移民營。或者由政府提供原料給民營工廠加工，再收購成品，以減輕民營工業的負擔與風險。

雖然政府為輔導民營工業發展，擔當了以上許多任務，可是在我國工業發展初期，基礎薄弱，無論就設備規模、生產技術、產品品質、銷售系統及成本，都無法與工業國家相同產品競爭。因此，政府進一步採取保護政策，以輔導新興工業的建立。但政府深切了解，在保護政策下，消費者或其他方面不免遭受損失；被保護之工業，因不虞國外產品的競爭，而不免進步緩慢。於是在保護一段時期後，逐漸降低保護程度，改以財稅與金融措施，激勵民間投資。不過為避免民間資本過度集中，危害國家整體利益，對於有獨占性、壟斷性的公用事業與基本原料工業（如石化上游原料），皆由國家經營。同時鼓勵民間企業股票上市，期望資本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避免資本所有權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但又可集中使用，俾建立大規模生產事業，以提高對外競爭力與應變能力。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民營企業不斷壯大，民營製造業生產在此三十三年間（四十二至七十四年），平均每年增產達一六·六%，較公營製造業生產每年增加八·一%，高出一倍以上。因而民營製造業生產占製造業總生產的比重，至七十四年已高達八八%，公營降為一二%（註七），民營企業已成為整個經濟活動的主幹。同時，近年來第二代年輕企業家階層逐漸茁壯，此對我國未來工業升級，將極有助益。

4. 積極拓展出口貿易

臺灣屬於海島型經濟，資源貧乏，多依賴進口供應。但在經濟發展初期，外匯短缺，對進口不得不加以管制。在四十年代，曾發展進口替代工業，以節省外匯，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經濟成長。但因國內市場狹小，進口替代工業很快即達到飽和，失業

問題仍然嚴重；而且因原材料及機器設備進口的增加，貿易逆差問題仍不能解決。幾經研究，唯有拓展出口，突破國內市場狹小的限制，方能解決上述困難。但在當時拓展出口，亦同樣有其困難：

(1)當時所建立的制度及法令規章，均是早年在因應物價膨脹，及在保護政策下所訂定的，無法適應千變萬化的國際市場需要；

(2)我國勞力密集的消费工業，却是在保護政策下建立的，成本高、品質差，缺乏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能力；

(3)當時新臺幣的對外價值，因唯恐影響國內物價，有明顯的高估現象，不利於出口；

(4)當時出口的主要產品為糖、米及鳳梨罐頭等，主要是透過公營事業的中央信託局，與日本以易貨方式進行，一般企業缺乏拓展對外貿易的經驗與人才。

面對以上困難，政府毅然採取一連串改革。首先實施外匯貿易改革，大幅貶低新臺幣價值，並將複式匯率改為單一匯率；對出口所需進口原材料，充分供應外匯；擴大出口退稅範圍；繼而實施十九點財經改革，頒布獎勵投資條例並改善投資環境，解除管制，恢復市場機能，簡化行政手續，且以多種租稅優惠鼓勵出口；同時創辦外銷貸款，以較低的優惠利率（如一般放款年息二〇%，外銷貸款僅七·五%），充分供應外銷事業長期資金。在此全面的鼓勵下，兼以低廉工資的優勢，我國出口乃得以快速成長。

(三)重視基本設施建設——發達國家資本

基本設施包括電力、鐵路、公路、港口、機場及電信等。此等設施需要鉅額投資，建設期間長，投資報酬率低，甚至投資無

法收回，為民間所不願投資。但此等基本設施為經濟發展所必需，並可產生外部經濟，降低成本，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而刺激生產投資活動。故在過去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不斷投入鉅額資金從事基本設施的建設。諸如六十年代進行的十項建設，其中七項是基本設施；在十項建設完成後，繼續進行的十二項建設，及正在進行的十四項建設，主要項目均為基本設施。過去三十多年政府每年用於基本設施建設的投資，占固定投資總額的比重，高達二五%至三〇%。無疑地，此類基本設施建設，對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與國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極有貢獻。因此，我國發達國家資本的重點，是在為社會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活與經濟活動的環境，使全民共享經濟建設的成果，而不是與民爭利。

四有效利用美援——利用外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對自由世界各國給予援助，其目的在協助受援國家穩定經濟，開發資源，提高生產力，俾受援國家在自由經濟體制下，依自助與外援配合原則，達成經濟的自立與成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從而加強受援國之防衛力量。而美國對臺灣地區之經濟援助遲至四十年方開始，至五十四年六月底即結束。當美國於五十四年六月對臺灣經援結束時，在所有接受美援的開發中國家中，能够有效利用美援，達到美國援助所預期自立成長目標的國家並不多，我國被認為是運用美援有效，已具有自立成長能力，第一批提前結束的三個國家之一。

我政府在接受美援之初，即秉持「國父『操之在我』」的立場，以「美援運用本身不應有獨立政策，如有政策，應在如何使美援密切配合國內需要」的最高指導原則下，運用美援（註八）。雖然根據美援規章之規定，美援的運用，須徵得美方之同意，在洽商過程中，美方亦會有不同意見，但由於我國的基本政策目

，在穩定經濟、加速經濟發展，與美援的目標不謀而合，幾經溝通後，美援之運用頗能配合我國政策之需要。美方亦曾藉洽商溝通之機會，影響我政府部分政策或措施之形成；不過美方之意見，多有助於我國經濟目標之達成。

自四十五年至五十四年之十五年間，我國接受美國經濟援助計約十五億美元，平均每年一億美元（註九）。在接受之初，我政府即要求美方配合我國外匯運用，進口必需之物資為主，對當時物價之穩定極有幫助。稍後，我國於一九五三年開始實施四年經濟計畫，即要求美方運用美援配合我國農、工、交通運輸建設之需要，以支持經濟建設為主。同時由於引進美國事後審核制度，因此對美援支持的計畫，其資金的運用，進度的掌握，除極少數外，都能嚴格執行，使美援運用，不致浪費。因此，我國在接受美援期間，有效利用美援配合不同階段的需要，作適當的調整，此對我經濟穩定與加速經濟成長極具貢獻，並奠定自立成長的基礎。故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底美援停止後，我國經濟仍能繼續穩定而快速的成長，美援奠基工作，其功不可沒。

四、實踐民生主義的成果

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除經濟基礎極為脆弱外，復遭受國際政治外交，及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但由於國人的莊敬自強，貫徹實施民生主義的基本政策與措施，不僅將絕大多數問題克服，而且獲有顯著的成果（註十）。茲簡述如下：

（一）自落後的農業社會，轉變為新興工業化國家

一般而言，農業國家即是落後國家，工業國家即是現代化國家。故落後國家為求國家進步，無不大力發展工業，希望能迅速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但根據過去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落後國

家要求國家進步，有兩種政策可供選擇：一是全力發展工業而不重視農業，一是農工兼顧的發展。採取前一種政策的國家或地區在亞洲有韓國、印度及中共大陸等。僅韓國可稱成功，印度與中共大陸，到今天仍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所得及生活水準極低。但就已成功的韓國而言，由於開始時未重視農業，農業的進步緩慢，使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遭遇了長期的物價膨脹、貿易鉅額逆差、投資財源不足、大量舉借外債、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嚴重問題。我國則是採取後一種政策。政府深深了解，我國數千年來均以農立國，欲求國家進步，必須先從改善農業着手，奠定農業基礎，以農業的力量支持工業發展，待工業壯大後，農業遭遇困難時，再由工業支持農業，這樣的發展可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於民國三十八年宣布實施「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政策，並積極展開一連串的農地改革工作。由於農地改革成功，農民收入提高，激起增產興趣，農業生產大幅增加，農產品的充分供應，除具有促進物價穩定的功效外，還提供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原料；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的外銷，賺取外匯以供購進工業發展所需進口的生產設備及原料；同時，由於農民所得的增加，不僅購買力提高，消納了工業產品，而且農民將多餘的資金（儲蓄）投入金融機構，成為工業發展所需資金重要來源之一。工業在發展初期得到農業的多方面支助，迅速建立並不斷壯大。但在五十年代中期後，國際上由於綠色革命成功，各國增產，使臺灣外銷的糖、米、洋菇及蘆筍罐頭等等農產及農產加工品外銷，遭受嚴重打擊。政府為紓解農業困境，除降低肥料價格，以減輕農業生產成本外，並採取多項措施，包括中央政府直接撥款支持農業建設，以高於市價的價格保證收購農產品等等，使農業渡過難關，恢復過去的活力。政府以鉅額資金支持農業，主要因工

業快速發展，租稅收入增加，得以工業間接幫助農業發展。三十多年來，由於我國採取此種農工相輔相成的發展策略，克服了許多困難，不僅農工生產得以迅速成長，四十二至七十四年的三十三年間，農業平均每年增產三·五%，工業增產一·七%，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生產增加率；而且產業結構轉變極為迅速，農業生產所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自四十二年的三四·六%至七十四年降為六%，而工業生產所佔比重，同期則自二一·三%提升到四九·七%，多年前即被國際間稱為新興工業化國家之一。

(二) 自惡性物價膨脹，進步為穩定而快速成長

臺灣光復初期，由於戰爭的破壞影響生產及復員需要的增加，物價上漲甚為激烈，自三十五年初至三十八年六月的三年半間，物價平均每年上漲九二·二%，情況極為嚴重。一般而言，物價膨脹的基本原因，是物資供不應求，故其解決之道在如何增加供應與減少需要，使供需能夠平衡，物價恢復穩定。在工業國家克服物價膨脹的經驗，因提高供應需要大量投資，短期內反使需要增加，對正在上升的物價無異火上加油；故多從需要面著手，壓低需要，犧牲經濟成長方式，謀求物價的穩定。但我國在當時國內需要方面，不論民間消費、政府支出或投資，均有迫切需要，難予削減，故只有從增加供應著手。不過當時增加生產提高供應能力，並不若工業國家需要大量投資。在農業方面，則從制度著手，實施農地改革，增加農民所得，提高其增產興趣，亦不需要大量資本投入。在工業方面，除以小量的資金，修復戰時遭受破壞的設備，使能迅速恢復生產，供應需要外；新的生產計畫，亦多不需要大量投資，而是充分利用國內農業資源及勞力，因陋就簡發展勞力密集的民生工業，使生產迅速增加，提高供應能力。另一方面，當時影響國內物價劇烈上漲的因素中，除物資供應

不足外，國人對舊臺幣失去信心，亦為一大主因。故克服物價大幅上升，除增加供應外，如何建立人民對貨幣的信心，亦為重要課題。因此，政府籌謀幣制改革。當時改革幣制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即新貨幣不再漫無限制發行，同時需要黃金或外匯做為十足準備，方能取信於民。但當時省庫空虛，不僅沒有黃金，更無外匯。後經陳明中央，撥出八十萬兩黃金到臺灣，因而能够在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以十足的黃金準備，實施幣制改革，發行新臺幣，並規定發行限額，如需增發，同樣需要有十足準備；此外，先後創辦黃金儲蓄存款及優利存款（年息一二·五%），一方面確保新臺幣可以兌換黃金，另一方面誘導資金回籠，緩和通貨的增加，建立大眾對新臺幣的信心。

在多方面措施配合下，加以先總統 蔣公於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奠定了社會安定的基礎，以及美國於四十年恢復對我國軍經援助，使物價上漲率逐漸緩和（三十九年上漲八九%，四十年上漲六六%，四十一年上漲二三%），至四十年代後期（四十二至四十九年），平均每年物價上漲率更進一步降至一〇%以下。五十年代更由於生產力的大幅提高，超過工資上漲率，使每單位產品勞動成本下降，不僅使物價更進一步穩定，亦提高產品對外競爭力。因此在五十年代（五十至五十九年），我國消費者物價平均每年僅上升三·四%，與工業國家同時期上升三·三%比較毫無遜色；但每年經濟成長率我國則高達九·六%，較工業國家的五·二%，幾乎高出一倍。我國首次達成經濟發展史上，各國所追求的經濟快速成長與物價穩定的雙重目標，因而被國際間譽為經濟奇蹟。

進入六十年代，雖然遭遇兩次石油危機，使我國物價在最近十五年（六十至七十四年）平均每年上漲率，升高至八·二%